

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 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

张德明

内容提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基督教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但面对国难,教会内部对于如何救国产生了争论。武力抵抗派除了呼吁武力抗击日本外,还成立战区服务委员会,开展前线军人与伤兵的服务工作;唯爱派则坚持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采取发表宣言、祈祷、寻求国际支持等方式救国,并成立信行救国十人团;稳健派则主张发动民众,作长期抵抗,或向前线捐款捐物,或参加后方伤兵救护。华北基督教会开展的抗日运动,虽然形式多样,但都彰显了广大中国基督徒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责任感,对全民族抗战贡献了应有之力,也体现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调适。

关键词 华北 基督教 抗日救亡 民族主义

基督教自近代大规模入华传教后,实行政教分离,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多持消极逃避态度,不鼓励基督徒与教会学校师生参与爱国活动,为此经常受到中国人的批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运动格格不入,“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同外来宗教的宣传相敌对的;传教组织,不管它抱有如何无私和慈善的动机,一般都被看作是与民族发展不相容的”。^①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加剧,华北地区成为中日交涉的前沿地区,社会各界掀起了救亡热潮。华北基督教会面对日本的侵略,也开展了积极的救亡运动,只是其内部对救国的具体方式产生了争论,然而学界对此研究却较为薄弱。^②本文拟考察1931—1937年间,华北基督教会面对日本侵华

*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2015M571222),曾提交参加第三届“宗教·法律·社会”学术研讨会。另本文提及的华北基督教会,特指华北地区基督新教的各教会组织,文中有时简称为“教会”。

①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8页。

② 如,顾卫民:《国难与中国基督徒》(《史林》1995年第2期)、俞祖华:《基督徒与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晓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及姚西伊:《“九一八”后中国基督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文章,对此问题有综合研究,但涉及华北基督教活动的内容较少,且在具体史实与史料运用上仍有深挖的必要。

所做的应对,分析其在抗日问题上的实践与争论,探究其开展的具体救亡活动,进而认识来华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鉴于史料与篇幅所限,有关华北教会学校与天主教的抗日救亡活动,将另作专文讨论。

随着日本侵华的咄咄逼人态势,基督教若不予因应中国人民的抗日心理,必将被中国民众所抛弃。特别是出于中国人本能的爱国之心与民族感情,处于日本侵略最前线的华北广大中国基督徒,或声讨日寇,或捐钱捐物,或进行医疗救护,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救国工作。此时期,华北基督教会正在开展振兴教会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以下简称“五年运动”或“五运”),将该运动与抗日救亡密切结合,他们认为五年运动就是救国运动:“五运的种种工作,恰是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当这国难方殷的时候,我们做爱国的种种运动,切不要忘记了五运这种根本救国的运动。”^①在民族危机日渐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基督徒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自不能置身事外,他们从基督教义内寻找救国思想资源,体现了基督徒的强烈使命感。教会人士认为:“我们并不是提倡狭义的爱国主义,也并没有受任何党派所利用,我们要救亡,乃是因为我们要维护正义!”^②当时华北各大教会报刊,纷纷刊登中日问题讨论,提供解决国难问题方案,讨论中国基督徒与国难的关系。如,1931年10月的《华北公理会月刊》刊登了《中国基督徒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的认识及准备》《国难时期基督徒信仰问题》《我对于现今时局的感想》。北平的《真理与生命》则刊登了《基督教对于日本侵占中国国土应当持什么态度》《基督徒今日为国难的奋斗》《信徒对于国事第一步的工作》等文章。因对中日时局、教义等方面的认识差异,基督教会内部对于救国方式有不同见解,而纵观华北基督教会各派的救国行动与建议,根据当时基督徒的看法^③,大体分为武力抵抗、唯爱及稳健三派,现分别叙述。

一、武力抵抗派的言行

基督徒中的武力抵抗派认为基督徒固应主张和平,然抑制强暴是实现和平的必由之路,提出武力抵抗是出于自卫,不是侵害他人,为维护世界和平,不得不武力抵抗。如有基督徒提出:“我们要想和平,只有与野蛮主义、军国主义者相抗,同时用我们的武力来用以自卫,那正是我们去求和平。”^④还有基督徒认为:“如日兵无故占我土地,杀我同胞,则自卫的武力抵抗是应当的。中国如欲做和平运动的一分子,第一须先有武力的准备,有了足以自卫的武力,方能谋中华民族的出路,方能扶助弱小民族求解放。”^⑤亦有基督徒针对日本的暴行,提出凡属基督徒不论国界,都应反对其暴行:“我们主张武力铲除世界的暴力暴行,当如不是基于狭隘的爱国心,甚至可以说并不是有甚么国界的成见。”^⑥《野声》发表的《告全国基督徒书》中提出:“如果非武力不足保障世界和平,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借用武力呢?如果非战争不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参加战争呢?”^⑦再如“基督将军”冯玉祥于1931年10月在北平发表通电,希望政府:“团结民众,一致对外,

① 曹新铭:《五年运动就是救国运动》,《中华归主》第124期,1932年3月1日,第14页。

② 黄培永:《基督徒学生与救亡运动》,《消息》第10卷第7、8期合刊,1937年10月,第44页。

③ 参见张祖翼《基督徒于东省事件态度的剖解》(《女青年》第11卷第1期,1932年1月)及陈晋贤《基督徒对于国难态度的分析》(《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5期,1932年5月)两文的分析。

④ 鹄翘:《自卫是爱护和平》,《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3期,1932年3月,第12页。

⑤ 檀仁梅:《基督与武力》,《唯爱》第10、11期合刊,1933年11月15日,第63页。

⑥ 谦:《基督教与非战主义》,《兴华杂志》第28卷第40期,1931年10月21日,第6页。

⑦ 《告全国基督徒书》,《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3页。

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为民族生存之防御,以雪无上之奇耻。”^①部分教会还组织救国会,抗日态度比较坚决。针对日军不断侵占东北领土,山西汾阳教会组织的基督教救国会发布宣言称:“如日本一再执迷不悟,得寸进尺,国际联盟不能保持和平,主张公理,为求生死计,只有全国武装起来,对日宣战。”^②1931年11月,作为基督教全国性组织的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以下简称“全国总会”)亦致国内诸从政基督徒,反对妥协,“希望从政基督徒为国牺牲,拥护正义,雪我国耻。本会全体会众追随领导,誓作后盾,并通行各大区堂会11月15日一致举行国难公祈”。^③1933年初,在北平青年会组织的学生会议中,有基督徒还指出:“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空的,除非我们战斗,中国就没有希望。如果我们希望延续中华文明,我们就必须战斗。”^④当然,受基督博爱精神影响,此派主张虽然符合抗日实际,但在中日战事初期,并不为多数基督徒接受。

武力抵抗派中除少数基督徒赴前线参军抗日外,更多地体现在战区服务工作方面。因日军进犯热河,长城抗战开始,1933年2月底,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简称为“战委会”。^⑤战委会之服务工作涉及募捐、收送慰劳品、备置及输送医疗药品,组织急救训练班、举行战况报告及演讲,使一般民众得悉战事情。该会最初在北平设立战区服务部,聘北平青年会干事全绍文为主任,主持前方实际工作,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一带先行设立招待处。战委会聘请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并请其通告全军给予承认及保护,对该会涉及的慰劳品、仪器等运费给予优惠,并实行免税免验。^⑥1933年3月24日,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在保定向蒋介石面陈战委会计划,受到蒋介石肯定,并令军需处拨付2.5万元给予支持,其余经费由各地青年会联合募捐7.5万元。^⑦战委会的成立,也是青年会全国协会首次成立全国性的战区服务组织,开创了基督教战区服务的先河。

华北各青年会后来多参加战委会的服务工作,分为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大同等12个分区,并相继成立了服务部。各服务部的具体活动,主要围绕前线伤兵与军人的需要展开,各部多设立普通招待处、伤兵招待处、伤兵医院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及军人俱乐部,在前线及后方医院开展慰问与救济伤兵、难民工作,还通过放映或表演向民众宣传战事。^⑧为保证服务质量,北平天津青年会干事联合会在1933年初分组到前方考察战地实况及前线官兵的需要,前方将领对他们的服务计划表示赞同,并称:“彼等之兵士生活,殊感枯燥,大有增添其趣味之必要。”^⑨同年3月25日,战委会派员从北平青年会出发,携带大宗伤兵用品到战事沿线的蓟县、遵化等地,设立伤兵招待处,除提供医药外,还为伤兵组织教育班、代写家信处,以及娱乐等服务,并为受伤将士特设厨房,预备粥汤热食等。^⑩1933年春,北平区服务部创办军人俱乐部,平均每日有200余受伤军人来此娱乐,特别

① 《冯玉祥通电》,《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32页。

② 《汾阳基督徒抗日救国会宣言》,《兴华周报》第28卷第44期,1931年11月18日,第30页。

③ 《致国内诸从政基督徒书》,《总会公报》第3卷第8、9期合刊,1931年11月,第803—804页。

④ 邢军著,赵晓阳译:《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⑤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编印,第74页。

⑥ 《梁小初电蒋中正》(1933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75/028。

⑦ 《梁小初电蒋中正》(1933年4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076/057。

⑧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74—75页。

⑨ 《战区服务工作报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版,第37页。

⑩ 《全国青年会战地工作》,《兴华周刊》第30卷第13期,1933年4月12日,第30页。

是各种棋类游戏,颇为军人所爱好^①;保定区服务部自1933年成立军人俱乐部以来,每日来者都有二三百人,其设有休息室,还有留声机、书报等,并设席棚,以备官兵休息喝茶,还派员到伤兵医院服务^②;战委会在唐山兵站医院也设有服务部,该部通过医院内的青年会室提供各类娱乐活动,队员还轮流到病室慰问,并为伤兵代写家信,放映电影,受到伤兵欢迎。^③随着长城抗战结束,战委会的工作也在同年8月底停止活动。战委会所至各处,无不备受军事当局及士兵欢迎,并蒙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与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馈赠锦旗,以志纪念。^④青年会的此次战区服务基本完成了其工作计划,这得益于全国各基督教团体打破教会派别限制,在人才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协助。如,张家口战区服务部曾与该地的美普会、救世军、神召会、安息日会等教会合作,在救护妇孺工作上协同救济。^⑤特别是在战区服务方面,“此种开创工作之价值所在,则早已证明,尤其在中国军队中,更能适应实际的需要”。^⑥

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后,青年会全国协会又根据1933年在华北战区服务的经验,组织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该会派员对前线情形进行调查,取得阎锡山、傅作义的许可后,在归绥设立总部,由北平青年会干事萧泗千出任总干事,并在集宁、大同等地设立支部。^⑦傅作义对青年会1933年战区服务印象深刻,当时称只允许青年会来前线服务,因他认为:“青年会是以服务为目的,我们知道你们没有背景,所以很欢迎你们来。”^⑧服务部为伤兵、军人及军官成立俱乐部,为官兵举行文体类的游艺活动,并在医院慰劳伤兵。该会成员从华北各青年会干事中抽调,计21名,另有技师6人,“在武川、百灵庙、集宁、陶林、兴和、大同等处工作,极为各士兵所欢迎,傅作义主席尤为优待”。^⑨如,集宁区服务部除成立军官、军士俱乐部外,还为士兵放映电影,并组织篮球比赛与春节游艺大会;绥远区服务部则于1937年1月17日至19日举行慰劳官兵游艺大会,演戏三天,每次到会人数均在千人以上^⑩;同年2月28日,绥远区服务部还在归绥举行了赠送“抗敌受伤将士纪念奖章”典礼,傅作义出席并致辞,全场伤兵及观礼人员达一千六七百人。^⑪随着战事结束,服务部于3月底结束了在绥远、集宁等地服务,傅作义赠送服务纪念章,并特致电青年会全国协会表示感谢。此外,该会大同服务部活动尤为显著。该服务部成立军官俱乐部及伤兵俱乐部,在1937年2月举行慰劳游艺会与防空防毒展览会。当时,云冈伤兵医院俱乐部有伤兵及病兵170余人,服务部为他们成立识字班、研经班、讲故事及歌咏班。^⑫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针对前线官兵的实际需要开展活动,尽力救助伤兵,特别是满足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为1937年后更大规模的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成立积累了经验。

武力抵抗作为最为有效的抗日形式,因基督教一贯反对暴力,故起初持该派主张的基督徒属于少数。然此派基督徒坚持呼吁武力抗日,打击了基督教会内部的妥协投降的思潮,并随着日本侵华

- ① 《青年会战区服务》,《北平青年》第24卷第19期,1933年6月5日,第4页。
- ② 《战区服务部每日在重伤医院服务》,《保定青年》第19卷第6期,1933年6月30日,第2页。
- ③ 《前线寄来的信》,上海《申报》,1933年4月20日,第8版。
- ④ 梁小初:《国难中之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1933年,第175—176页。
- ⑤ 南秉方、李安民:《张家口战区服务部报告》,《同工》第123期,1933年6月15日,第22页。
- ⑥ 《战区服务工作报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3年)》,第42页。
- ⑦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ear Book, 1936* (Shanghai: Association Press, 1937), p. 18.
- ⑧ 《萧泗千君报告前方工作情形》,《消息》第10卷第2期,1937年2月,第32页。
- ⑨ 《军人服务会决继续绥远服务》,上海《申报》,1937年2月3日,第15版。
- ⑩ 希孟:《战区服务部消息》,《北平青年》第28卷第19期,1937年1月28日,第2页。
- ⑪ 《战区服务工作汇报》,《同工》第161期,1937年3月15日,第29页。
- ⑫ 《战区服务部最近工作报告》,《同工》第162期,1937年5月15日,第18页。

加剧,成为多数基督徒接受的主张。特别是青年会的战区服务工作,在支援前线服务中贡献颇大,这更是武力抵抗派基督徒直接服务抗战的务实行动。

二、唯爱派的言行

唯爱派基督徒以中国唯爱社的成员为代表^①,该派站在耶稣唯爱主义的立场,反对武力抵抗及用战争解决问题,认为:“战争的途径,根本上与基督教唯爱的精神相背驰。战争的目的在力服,基督教则主感化。战争所用武器在毁灭,基督教则主救赎。”^②该派根据唯爱的原则,主张要用精神的方法、非武力的方法——如不合作及经济绝交,在耶稣面前为日本及中国忏悔等方法促醒日本。如,有基督徒指出:“唯爱是决不能用武力流血的,决不能用不良的手段去达到好的目的,战争的事,是唯爱主义所极端反对的。”^③1931年10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真理与生命》的社论中提出基督徒应对国难的方法:对全世界信众特别是日本信众宣传事实真相;为中国政府、人民及世界一切主持公论者祈祷;加紧信众人格的训练;提倡对日经济绝交及国民绝交;本耶稣精神及信徒自己的理解参加救国运动。^④还有基督徒在《教务杂志》刊文称基督徒对于中日危机态度,应是坚定对耶稣的信仰,坚信正义必胜,需要有追求真理及与邪恶战斗的勇气,开展促进维持和平的工作,但不能参与战争,可抵制错误的观念并给予必要的谴责,促进中日民众的沟通。^⑤唯爱派基督徒的主张多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问题,对时局影响甚微,甚至对抗战产生消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基督教会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采取应对此次事变的策略,基本与唯爱派主张类似。1931年9月28日,作为全国性基督教联合机构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分别通过致电国际联盟、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日本基督教协进会及全国教会书,呼吁各团体一致主张公道,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并请日本协进会敦促日本政府从速通令撤兵。协进会态度比较中和,在《敬告全国教会书》中呼吁国际力量主持公道,同心为国祈祷。^⑥全国总会主办的《总会公报》则特别发布《紧急的重大事件》通知称:“希望我基督徒断难坐视,当人人急起直追共赴国难,尽心尽力参加各项救国事件;切实与日本人断绝经济关系,并贯彻不合作主义;拥护国家团结;谋求国际同情;纪念我关东各地在患难中的同道和百姓。”^⑦该会还致电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转各教会,请求将真相传布国际联盟及各教会,唤起基督教舆论,维持正义与和平。^⑧以上全国各教会的宣言或决议,仍是主张采取非暴力的方法处理中日问题。

华北基督教各教会还纷纷致电协进会,要求其主持正义,维护和平。1931年9月30日,山东临清公理会致电协进会,提出:“日本恃强,占领中土,公理灭弃,战端在即,万望电请国际联盟会,从速制止日本轨外行动。”^⑨保定的长老会、救世军等各教会团体联合会也致电协进会,望其函请世界各国基督教团体主持公道,共维国际信义。同时,教会还用自己特有的祈祷形式,为国家和平祈福,激励、警醒信徒的爱国意识。1931年10月1日,北平各教会选派代表开祈祷会,致电协进会主

① 关于中国唯爱社的详情,参见姚西伊《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徐宝谦:《国难与基督徒》,《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4期,1933年1月,第3页。

③ 邱运焘:《唯爱新解》,《唯爱》第15、16期合刊,1934年12月1日,第50页。

④ 《卷首语》,《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1期,1931年10月,第1—2页。

⑤ W. H. Ma, “Christian Attitudes in China’s Crisi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VII, No. 9, September 1936, p. 538.

⑥ 《为日军侵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圣公会报》第25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第10—12页。

⑦ 《紧急的重大事件》,《总会公报》第3卷第6、7期合刊,1931年9月,第759页。

⑧ 《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转各教会电》,《总会公报》第3卷第8、9期合刊,1931年11月,第803页。

⑨ 《临清基督教公理会致协进会电》,《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29页。

张和平,同时讨论在此局面下的应对方策,并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名义致电日本基督教同盟,请求日本基督徒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暴行:“万希贵国信众与同人等戮力同心,一致进行,促使满洲局面早复原状。”^①总体而言,当时各教会多主张不必直接与日本“为难”,尽力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对外披露,或诉之国联,或诉之非战公约的国家^②,带有浓厚的唯爱色彩。

“一·二八”事变后,在华基督教会又掀起救国热潮,但仍多以发表宣言为主,反对暴力。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发表《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呼吁和平解决争端,称:“希望教友组织联合祈祷会,务求上帝灵能,对侵略之凶暴,予以制止,尤其中日基督徒团结一致,高举基督,维护和平。”^③全国总会在事变发生后发布《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表示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恶意和报复,认为基督徒面对国难,应有坚持根据事实拥护真理的勇气,应该尊重人类的权益和人格。^④青年会全国协会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还联合于1932年2月19日发布《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徒同学书》,反对学生的暴力抵抗,主张救国之道,在于各尽其守、各专其事,基督徒同学应进行救济难民,联络工商各界,推动不合作运动,并在民众中宣传国难。^⑤北平基督教联合会致电协进会,并转上海基督教各团体,表示慰问,希望中日争端和平处理。但是,此类布告仅能起到宣传作用,并不能左右战局发展。

在长城抗战与绥远抗战中,唯爱派基督徒仍然多以发表宣言与祈祷支持抗战。北平基督教联合会曾于1936年11月发布为国祈祷宣言,希望基督徒:“须主张公道,力持爱义,阐发圣教之底蕴,指陈强权之罪恶……以参加救国,实行工作为事。”^⑥此外,教会还利用自身特殊环境,为救亡运动提供帮助。如,山西太谷公理会曾两次为太谷学生抗日救国会提供教堂作为集会场所,而教会虽不赞成救亡人士的过激行动,但在爱国分子遭到搜捕时,也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这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体现。

曾是西北军重要将领的基督徒张之江在这一时期组织了信行救国十人团^⑦,提出推广基督教义、改造人心为救国之根本方法,其宗旨是:“本基督教义及其牺牲爱人救世之精神,阐扬真理,唤起全民,共同救国。”^⑧该团十人为一组,注重个人祈祷、查经及锻炼体魄,在华北各地多有成立。如,1934年6月,济南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召开成立大会,并相继成立了12个十人团。^⑨同年,北平也成立了十人团组织。1935年1月,张之江在滕县证道,讲述信行救国方策,结果组织18个十人团。^⑩信行救国将布道与救国相结合,要求成员:“每礼拜至少须与人谈道一次,每一年内最低限度,引一人信主。”^⑪该团活动受到蒋介石肯定,蒋于1934年致电张之江称:“为国贤劳无任嘉勉,仍希努力进行为荷。”^⑫实际上,信行救国十人团的活动仍是非暴力的形式,属于唯爱派的范畴,但为基督教救国形式的新探索。

① 《北平基督教联合会致日本基督教同盟电》,《中华归主》第120期,1931年11月1日,第12页。

② 陈晋贤:《基督徒对于国难态度的分析》,《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5期,1932年5月,第14页。

③ 《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自理月刊》第2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4月,第22—23页。

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总会公报》第4卷第2期,1932年4月,第995页。

⑤ 《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徒同学书》,《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3期,1932年3月,第37—38页。

⑥ 《北平基督教联合会为国祈祷宣言》,《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6期,1936年11月,第381页。

⑦ 关于张之江组织信行救国十人团的概况,参见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年版。

⑧ 《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简章》,《布道杂志》第5卷第3期,1932年5月,第73页。

⑨ 《济南中华基督徒信行救国十人团消息》,《真光杂志》第34卷第1号,1935年1月15日,第71页。

⑩ 《张之江在鲁证道》,《通闻报》第5号,1935年2月,第12页。

⑪ 《北平信行救国十人团纪念会演讲补志》,《通闻报》第12号,1935年4月,第6页。

⑫ 《蒋委员长勉十人团努力》,《信义报》第22卷第39期,1934年10月,第669页。

当然,唯爱派基督徒的言行也遭到部分基督徒的批评。如,济南广智院的基督徒王梓仲虽然认可耶稣“爱”的精神,但“若一味的不抵抗与罪恶妥协,而反说是爱仇敌,未免污辱了耶稣的精神与教义”。^①还有基督徒批评说:“抵抗强暴,作正当的防卫乃是每个基督徒应负的责任,无论这种防卫是否出于武力!光是提倡无抵抗是无济于事的,是亡国者的行为,是懦弱者消极的举动,是不适合于一国国民性的要求的。”^②此类对唯爱派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看清了该派主张对日本侵略认识不足且无助于激励全国人民抗日精神的弊端。

中国唯爱社重要成员徐宝谦主张国际间的谅解与合作,提出联合国际上的教内外开明分子,平时以国际通讯、友谊代表、圆桌会议等种种方法,使中日两国人民,得以信使往返,达成真正谅解。^③1934年8月14日至18日,由基督徒顾子仁、徐宝谦等筹划,在北平举行了中日基督徒会议。日本方面有来自东京的松原岩、菅圆吉等五位基督徒,中国方面则有顾子仁、徐宝谦、王梓仲等八人参加会议。中日代表在会上讨论了东方基督教徒对于国际关系的主张、中日两国青年的生活与思想、激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农村的改造、民众的教育、公民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及基督教的现状等问题。^④会议最后成立了一永久团契,即“西山团会”,推松原岩、徐宝谦为该团负责人。此次中日基督徒会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基督徒的交流及对彼此国家的认识,但并未影响双方政府的高层决策,这也是基督教影响力毕竟有限所致。

纵观唯爱派基督徒的言行,仍是从基督教义出发,反对使用武力,主张用爱解决问题,提出和平、不合作等非暴力方式处理中日争端,在基督徒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有人批评该派言行“不爱国”,有信徒反驳称:“一般中国人的心理,因受日本欺凌过甚的缘故,而主张战争。这是方法的问题,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和平就是不爱国,反过来说,战争也不一定是爱国的表示。”^⑤诸如此类回应,虽不无道理,但和平抗日的主张在当时既不可行也不被广大民众认可。特别是随着日本侵华行动的加剧,唯爱派基督徒的主张已不适应抗日形势的客观需要。

三、稳健派的言行

基督徒中的稳健派受基督教强调的忍耐及长期受苦精神影响,既不赞成武力抵抗的方法,也不赞成绝对消极的不抵抗主义,而是主张增强自身国力,发动民众,通过务实的行动救国,作长期抵抗的打算。华北公理会基督徒许光迪,认为须揭露日本侵略计划、野心,但不必勉强政府立刻对日宣战,全民应同德同心,联合起来同做自卫的准备,采取经济绝交、军事训练、加紧锻炼自身技能等方式抗日。^⑥作为基督徒的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认为救国首先需要阻止国内的兵争,即要杜绝外侮,必得止息内争,并提倡改革一切不良的制度,这比改革人心更切实际,可促使公义与仁爱早日实现。^⑦该派的主张带有中间调和色彩,既不激进,又不妥协,故获得不少基督徒的支持。

稳健派基督徒在救亡运动中,逐渐意识到应唤醒广大民众参与救国,信徒应与民众打成一片,要激发民众自救自强的救国意识,这是救国的根本之道。有北平信徒感叹:“国难当前的今日,对

① 王梓仲:《基督徒与国难》,《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1期,1932年10月,第36页。

② 应远涛:《抗日声中的无抵抗主义》,《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12页。

③ 徐宝谦:《国难与基督徒》,《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4期,1933年1月,第5页。

④ 徐宝谦:《中日基督徒会议概述》,《唯爱》第15、16期合刊,1934年12月1日,第69—70页。

⑤ 林启武:《基督徒的爱国与仇敌》,《唯爱》第6期,1932年11月15日,第39页。

⑥ 许光迪:《中国基督徒对于日本出兵东三省的认识及准备》,《华北公理会月刊》第5卷第8期,1931年10月,第13页。

⑦ 吴雷川:《经过“国难”的基督教》,《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3期,1931年12月1日,第10—11页。

日问题是一时未可轻忽的,而在工作之余,我们感受最痛苦的,就是没有民众的同情,那末〔么〕对于博得民众抗日的同情,尤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我们基督徒的救国运动,是以上述方法为手段,对日急切更急切的手段。”^①还有基督徒认为中国本土布道员面对九一八事变,应首先明确自己身份乃是中国人,还应做到:“本耶稣的精神,作解除民族痛苦的工作,使压迫的得自由,故应在各人所在的地方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力所能及的场合上,作抵抗日本运动,诸如抵制日货,举行识字运动,组织地方自卫等。”^②山东基督徒李彦林在赴乡间宣传抗日日,更感到民众缺乏对国事的认知,将日本入侵东北看作中国的内争,故号召基督徒与布道员应着力发动民众,指出此举也符合耶稣的主义,并应去唤醒那些知识浅的同胞,将所知道的国事急速地告诉他们。^③总之,广大基督徒逐渐认识到救国必须深入广大民众中去,发动民众,开展民众教育,提高其觉悟。出于传播福音的考虑,部分基督徒还主张救国更应在民众中传播基督教,如有教会人士指出:“若大多数的民众,得不到高尚的智识和道德,不明白基督教的真理与爱,即不能使中国得救。”^④

对于一直被国民提倡的抵制日货,稳健派基督徒却质疑其效果,认为应当积极提倡生产国货,而非消极抵制日货。如有基督徒称:“其实抵制日货,对于日本并无妨碍,我们拿什么东西去抵?然而所以行,也不过为了于主观方面觉得平安一点而已!其实日本人正在笑我们是傻瓜,便宜日货不买,反买贵的西洋货!”^⑤也有基督徒认为抵制日货被日本用作向国联控告中国人挑战的依据,“并以此为实施侵略的借口,特别是向日本国民提供了宣传的有力资料,而直接影响并不及于造祸的罪魁:资本家和傀儡的军阀,吃苦的倒是无辜的小工商与一般的日本民众”。^⑥从抵制日货的结果看,多数抵制日货运动的实际效果不佳,提倡国货反而是较有成效的行动,故部分教会为此发起提倡国货运动。如,当时北平公理会组织的妇女救国十人团,在《世界日报》上定期出版妇女救国专号以扩大宣传,并组织家庭合作社以制作各种毛线制品出售,作为支持国货的具体行动。

稳健派基督徒还采取实际行动救国。如,山西太谷基督徒于1931年底成立基督徒救国联合会,分布道、宣传及募捐三股,进行宣传演讲及募捐事项。^⑦长城抗战爆发后,华北各教会派人参与伤兵救护,通过务实的行动支援前线。张家口的挪威传道会即利用教会医院救助伤兵,并向中国红十字会请求经费及人员援助。^⑧1933年,北平救世军在北平国民伤兵医院进行伤兵救护工作,前后接收伤兵百余人。该处基督徒在看护伤兵的同时,还乘机传道,向他们传播福音,并鼓励他们参加每日清晨的祈祷会。每次公开聚会,亦多有自动参加者,且有立志求道及认罪归主者。^⑨同年4月,华北公理会在潞河中学成立伤兵医院,召集热心基督徒组织伤兵慰劳委员会,照料伤兵,并为他们提供娱乐服务。^⑩1933年6月,协进会还公开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公开募捐,得到华北各教会的大力支持。该派的救国行动从抗日实际出发,利用自身在医疗技术及基督徒人数众多的优势,为华北抗战提供了急需的帮助。

① 《北平区联农村服务委员会宣言》,《华北公理会月刊》第5卷第10期,1931年12月,第45页。

② 谢景升:《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宣教师应有的态度》,《紫晶》第3卷第1期,1932年1月15日,第17—18页。

③ 李彦林:《基督徒与传道士救国的方法》,《兴华周报》第28卷第50期,1931年12月30日,第13页。

④ 余牧人:《中国教会今后应努力的事工》,《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5期,1932年5月,第6页。

⑤ 《邨运兼复张雪岩》,《唯爱》第9期,1933年5月15日,第37页。

⑥ 张雪岩:《对日的态度与办法》,《唯爱》第6期,1932年11月15日,第33页。

⑦ 《山西太谷县基督徒救国联合会宣言》,《谷声》第32期,1931年12月31日,第34—35页。

⑧ 《张家口挪威传道联合会主席有关救济伤兵一事的函》(1933年4月),北京市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平分会档案, J023/001/00117。档案原文写作“挪威”,实是“挪威”,特此说明。

⑨ 《国民伤兵医院》,《救世报》第182期,1933年5月,第1页。

⑩ 《华北公理会成立伤兵医院》,《信义报》第21卷第22期,1933年5月31日,第1262页。

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具有浓厚“社会福音”思潮的来华教会团体,向来在社会服务工作中贡献颇多,除了前述比较激进的战区服务外,还在舆论与财物上支援抗日。青年会面对国难,首先呼吁基督徒救国。1931年9月25日,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发表告全国书,提出三点主张:“拥护国府将沈案诉诸国联,请求世界公断之政策;主张非武力抵抗,以促日本觉悟;组织小团体,以研究中日问题。”^①青年会还通过座谈会、印制抗日宣传品、组织演讲等多种形式参与抗日活动。如,1934年5月,烟台青年会邀请冯玉祥演讲抗日救国,冯氏在讲演中表达了对国事的不满。^②青年会的抗日活动还引起了日方不满,如1935年日方曾向中方抗议北平青年会知行社借基督教之势力开展排日行动。^③

华北各地的女青年会在全民抗日热潮的激发下,积极支援、捐助前线,开展战地护士培训。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女青年会于1931年9月29日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对日方法,提倡抗日救国,并通电揭露日本暴行。^④该会与北平男青年会共同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在具体行动上:提倡不购日货,不存款于日本银行,不向日本保险行投保;同时要求会员积极参加本市之抗日救国工作,并编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横暴史;各会员每日定时间锻炼身体以共御外侮等。^⑤北平女青年会还组织多个妇女救国十人团,提倡国货,研究国家的实际问题,并积极进行调查国货工作。^⑥此外,该会还组织热心妇女做纱布、绷带等,以备东北义勇军之用,并培训妇女参加后方救护队。“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女青年会又积极募款慰劳第十九路军。天津女青年会除为上海战事募款外,并做35打绷带、400套白布裤褂,运至上海。另,该会开设救护班,每次请医生、护士演讲救护知识,共开班10次,每次平均40余人。^⑦因当时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1933年初,北平女青年会特筹款慰劳东北义勇军,先后发出两批慰劳品。烟台女青年会也发起援助义勇军募捐运动,全体会员出发募捐筹款及衣服。^⑧绥远抗战期间,天津女青年会曾联合天津市各界妇女,发起组织绥绥救护会,募得千余元,购置布料棉花,制成被褥100余件,送往前方伤兵医院。^⑨北平女青年会发起绥绥运动,与北平妇女促进会成立绥绥筹备委员会,通过举办游艺会及提倡家庭妇女节俭筹款,募集御寒皮手套、皮衣及皮袜等,转送前方将士。^⑩女青年会所开展的力所能及的支持前线工作,虽然并不能改变战场局势,却体现出基督教团体的博爱与爱国之心。

这一时期,华北的外国传教士大多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国际上揭露日本的侵略与暴行。如对于国联的调查,美国公理会某教士曾形象地称:“这样的举动,以我看仿佛一处房子着了火,我们不应当先去调查是为什么着的,是谁点的,是怎样点的,我们乃是先去救火,等到火灭了以后,我们再调查这一切详细情形。”^⑪同时,传教士还利用自身优势在国外报刊上揭露日本暴行,支持中国的正义斗争,并有传教士在回国休假时发表专门针对中日问题的演讲。如华北公理会传教士博晨光(Lucius C. Porter)自九一八事变后,在美国各大城市做了40余次演讲,介绍中日此次冲突,并提出解决中国的东北问题,需要世界上各国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打败霸道的日本,但应抵制

①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告全国同工及会员书》,《野声》第2卷第2期,1931年10月,第26页。

② 《朱家骅电蒋中正》(1934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166/092。

③ 《管翼贤、陈方电杨永泰》(1935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18/121。

④ 《各校反日工作仍积极紧张》,《世界日报》,1931年9月29日,第7版。

⑤ 《北平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抗日救国会简章》,《华北公理会月刊》第5卷第8期,1931年10月,第29—30页。

⑥ 《妇女救国十人团与后方救护队》,《会务鸟瞰》1932年2、3月合刊,第9页。

⑦ 《会员部募款慰劳与组织救护班》,《会务鸟瞰》1932年2、3月合刊,第42页。

⑧ 《烟台市会事工大纲》,《女青年》第12卷第4期,1933年4月,第98页。

⑨ 《绥绥救护会》,《女青年》第16卷第3期,1937年3月20日,第64页。

⑩ 《妇女促进会与女青年会昨开绥绥联席会议》,《世界日报》,1936年11月24日,第8版。

⑪ M教士:《我对于现今时局的感想》,《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2期,1932年2月,第2页。

使用武力。^① 还有外国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刊文支持中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行动,认为此类行为并不违背基督教义。^② 当然也有类似唯爱派主张的外国传教士,不提倡武力抵抗,而是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抗日。在华传教士之所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受基督教博爱精神影响,另一方面也有防止日本入侵影响在华传教乃至本国在华利益的考虑。

四、结语

晚清以来,作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大潮中长期持局外旁观态度。当时,基督教会内部“认为救亡运动是有浓厚的国家和种族的色彩,基督是超国家的,超种族的,所以不能参加;认为这种运动是武力的和流血的,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所以原则上根本冲突;认为这是属乎世俗的,与属灵的无关,所以不赞成它”^③,以上认识是导致基督教会在救国运动中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其秉持政教分离的主张,不愿介入政治层面及意识形态的争执,免得自惹麻烦。但是,基督教会这种“不介入”态度在中国国难当头的关口尤不适宜,招致教内外人士的不满,“有好些青年基督徒,因为激于爱国家,爱社会的热忱,不满意于基督教的沉寂,就舍弃了固有的信仰,不顾一切,走入他途”。^④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中日直接冲突区,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被激发出来,他们通过多种形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中国基督徒既遵循基督教义的教诲,践行救国救世的行动,又努力尽到国民应尽的爱国义务,参与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基督徒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行动与基督教义中的爱人爱国的要求相切合,还驳斥了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反教宣传。中国基督徒参与救亡运动,证明他们并不是游离于世俗社会的特殊人群,而是基督教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是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体现。基督教会的抗日爱国行动,更是其融入中国社会,增强民众对其认同的努力,这既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积极尝试,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性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委员会^⑤的成立,以及大规模开展基督教救济活动奠定了基础。不可否认,基督教会的战区服务带有传教的功利目的,吸引了少数官兵入教。

华北基督教会内部对于救国方式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因基督教部分教义与爱国主义之相冲突,使有些教友感到困惑。如,少数中国基督徒“因鉴于国难严重,感觉着基督教信仰与爱国思想中间的矛盾,内心更觉不安”。^⑥ 有传教士对此争论则称:“基督徒不可拿圣经来证明对日宣战的是非,因为他们觉得基督的道理是不适用于战争问题的。”^⑦ 不过,基督教会内部关于救国方式的派别并非泾渭分明,不少基督徒的主张往往在两派之间徘徊,如武力抵抗派的部分基督徒也同时主张采取经济绝交、对日不合作的方式。特别是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基督教会内占多数的唯爱派及稳健派,也逐渐倾向于武力抵抗派的主张,这是基督教人士在认清日本侵华严重性之后的必然反应。日本

① 博晨光:《美国人眼中之中日事件》,《华北公理会月刊》第6卷第8期,1932年10月,第48页。

② Andrew Thomson, “Christianity and Nationalism”,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III, No. 3, March 1932, p. 140.

③ 漱渝:《读〈基督教青年的新觉悟和新出路〉有感》,《消息》第9卷第10期,1936年12月,第20页。

④ 吴雷川:《唯爱与学运》,《唯爱》第17期,1935年3月20日,第36页。

⑤ 关于该会的研究,参见陈智衡《抗日时期基督教会的军人服务——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史述》,李金强、刘义章主编:《烈火中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1937—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90页。

⑥ 徐宝谦:《1933—34年燕大宗教生活回顾》,《燕大团契声》,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1934年刊,第5页。

⑦ 张祖翼:《基督徒于东省事件态度的剖解》,《女青年》第11卷第1期,1932年1月,第11页。

侵华的步步紧逼,迫使更多基督徒放弃和平幻想,注重务实救国。正如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所认为的那样,“今日中国教会当少讲闲话,少宣传抽象之教义,多做实际之研究,多做事实之讨论”^①,努力研究国事,以指导民众救国。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中国基督徒从理论与行动上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还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外国传教士在华北抗战中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们向国外揭露日本侵略,便于其他国家民众了解中日冲突的真相。

[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徐志民)

《铭记与警示——九一八国难下的沈阳》出版

孟悦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25万字,48元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开展14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起点。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成果已然颇丰,自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至201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这一研究被再次推向高潮,本书就是其中优秀成果之一。本书参考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考证大量国内外原始史料,以沈阳为基点,着力反映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和占领沈阳的全过程,是一部深入细致阐述、分析九一八事变全过程的历史学专著。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考证大量的历史史料,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了充分的论证,字里行间彰显出考证的严谨。书中首次披露了八部没有公开过的日本原始史料,还包含100余幅反映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图片。例如,《满洲事变写真画报》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记录日军侵占沈阳的铁证史料之一;《满洲事变画报》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沈阳侵略掠夺的详细过程;《新版满洲事变的真相》是日本向国内及西方世界歪曲九一八事变真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证据;《满洲事变国防献品纪念录》公然把中国东北说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满洲事变》一书则歪曲历史,美化日方“企盼和平”“善良软弱”,斥责中国“不知感恩”,竟然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满洲上海事变殉国将士显彰录》为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战死日军歌功颂德,把他们美化成“精忠报国”的“殉国烈士”。以这些史料为基础,本书进行了深入有力的解读和论证,详尽统计和公开了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数据,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另外,本书结构严谨,叙述精炼。分十章对日本侵华的源流、九一八事变的背景和爆发的过程、中国的惨重损失、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进行了梳理。书中引用亲历者证言,并穿插图片,生动鲜活,既值得学界参考,也是大中小学生及军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的爱国主义教科书。(邢安臣)

^① 刘廷芳:《信徒对于国事第一步的工作》,《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4期,1932年1月,第4页。